

撤村并村应实事求是稳妥善后

□□ 谢庆富



部门沟通不畅,群众直接遭罪。部门之间不能相互推诿,也不能把产生问题的客观原因成天挂在嘴上。说到底,群众的利益大过天,现在不是查摆问题的时候,而是要尽快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言之,就是政府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导致36个村成为“黑户村”。

部门沟通不畅,群众直接遭罪。不论这36个村是如何成为“黑户村”的,如今36个村的几万村民面临办事难,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协调处理,到底是继续撤村并村,还是恢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总要有个说法。部门之间不能相互推诿,也不能把产生问题的客观原因成天挂在嘴上。说到底,群众的利益大过天,现在不是查摆问题的时候,而是要尽快解决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6个“黑户村”村民的权益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撤村并村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在全国第一轮撤村并村大潮中,大量行政村被撤并,有的地方村庄数量减少了30%左右,有的减少了40%左右,极端的甚至减少了60%左右。当年撤村并村,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促进村级经济发展,二是优化村级班子,三是减轻农民负担。但在撤村并村过程中,反对的村民较多,有大量人员到各级

政府上访。为平息群众怨气,很多地方都只进行了形式上的撤并,实际上依然是原样,即撤的村仍然运行,合并的各村实行分治。由于只是形式上的撤并,三个目的也就谈不上实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撤村并村之弊却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首先,撤村并村加剧了村与村发展的不平衡。撤村并村的原则是强村合弱村、大村并小村,整合资源以实现均衡发展。形式上的撤村并村后,虽然各村分治,但新村名大多采用的是原来的强村、大村名。经济薄弱村都有挂钩帮扶单位,每年都会收到大量帮扶单位支持的钱财物。而这些钱财物在分配时,强村、大村占据了大部分,弱村、小村只能占小部分。此外,挂钩帮扶单位在援建党群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础设施时,这些项目也基本是建在强村、大村。尽管这些设施也向弱村、小村村民开放,但村与村之间由于地缘、血缘等关系,彼此缺少认同,往来较少,弱村、小村村民基本享受不到这些服务。由于以上原

因,并村的结果往往是强村越强、弱村越弱,村与村之间发展差距反而拉大。

其次,撤村并村加剧了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撤村并村后,强村和弱村各自拥有自己的村干部队伍。村民委员会公章由村会计保管,在开展一些需要盖村委会公章的业务活动时,强村和弱村抢公章现象时有发生,有时甚至会动手。这主要是因为,为推动村干部积极性,各项业务活动都进行目标考核,干得快、干得好的村有奖励,落后的村不但没奖励还要受批评。哪个村先拿到公章,哪个村的活动就可以先开展,村干部就能得到奖励,所以为了抢公章都很“拼”。抢公章加剧了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加深了村与村之间的怨气,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团结。

第三是降低了弱村、小村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由于弱村、小村村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钱财物、各种机会等远不如强村、大村村民,资源分配不公致使弱村、小村村民感觉不到被认可、被接纳、被尊重,从而大大降低了弱村、小村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几年,一些省份掀起了新一轮撤村并村浪潮。撤村并村初衷虽好,但好事要办好,要让群众真正得实惠,就需要尊重群众意见、保护群众权益,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进行,条件不成熟的还是不要盲目跟风为好。

不妨多一点“土味”的宣传

□□ 江文

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一个由村民自愿组成的“板车宣讲团”很快行动起来,用舞蹈、小品、三句半、数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向群众宣讲四中全会精神,展现人民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虽是“土味”表演,但台上每个人唱得响亮,跳得起劲,台下观众听得兴起,情不自禁地跟唱、叫好。

众所周知,文艺要有更深远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就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娱乐等功能。小品、三句半、数快板等“土味”的宣传表演,也许难登大雅之堂,但基层农村群众对这些接地气的表演却喜爱有加。地方党组织发动基层群众的力量,让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土味”宣传表演,去为农村群众宣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也比专家学者“高大上”的宣传效果会更好。

宣传党的政策或会议精神,要真正入脑入心,就应该充分考虑受众的审美特点,要根据他们的审美需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去宣传,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农村群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一些大政方针的理解可能存在困难。只讲大道理,恐怕很多人听一会儿就会呵欠连连,听都听不进去,宣传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如此看来,“土味”的宣传表演接地气,契合了农村群众的审美需求,让他们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明白了道理,这样“润物细无声”式的宣传表演,肯定比机械照搬式的宣传表演,效果要好很多。希望各地在宣传政策的时候,多一些这样的“土味”宣传。



据媒体近日报道,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吊尾村200多亩萝卜,因网传“免费”的谣言,三天内被涌来的数千人几乎拔光。让三位种植户欣慰的是,经过媒体报道,部分拔萝卜者意识到错误,向他们送钱或转账补偿损失。目前,吊尾村村委已经挨家挨户宣传,请拔萝卜的村民按量给种植户付款。同时呼吁其他地方的拔萝卜者,也请给种植户们补偿。村委会正在联系一些农业公司和销售公司,为三位遭受损失的种植户拓展明年的销售途径。

这正是:

免费谣言传城乡,百亩萝卜三日光。
农户田间深惆怅,面对谣言多思量。

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互联网+农技推广”服务“三农”全天候

(上接第一版)

农技人员线上线下同提供高效服务

崔志斌口中的中国农技推广APP正是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该平台通过Web端、APP和公众号3个渠道提供服务。在该平台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农技人员和农民皆可注册使用,在这里可实现24小时全天候、无障碍沟通互动,跨时空高效服务。

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多样化的服务,助力打通科技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该平台分为“农技问答”“农情快报”“科技服务”等版块,可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据统计,目前,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有用户523.6万人,其中有36.5万名农技人员服务在农产生产一线。

“会有老师在冬闲等一些时候对我们开展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平台,我自己平时也比较爱学习,研究新东西。”崔志斌说,他很快就意识到平台的好处。

崔志斌白天忙工作,忙下指导,夜晚还在平台上忙着帮用户解答技术难题,近两年在农技推广平台上解答了3.7万余个问题。他活学活用农技推广平台,平时有问题上平台提,看到好的感想就保存下来,有什么工作成绩与感悟上传日志。2017年底,崔志斌上报了一条畜牧养殖方面的农情,帮助当地一位农户准确判断了

市场行情,减损了20万元以上。

崔志斌还带动农户加入农技推广APP学习,教他们在互联网平台上学知识,更教他们科学种田的本事。在崔志斌的带动下,当地农业系统掀起了利用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为农户排忧解难的“比学赶超”的优良风气。

除了农技指导外,众多的基层农技人员还冲在科技精准扶贫、重大疫情应急处置、秸秆禁烧治理、业务包村联户等几乎所有涉农工作的最前面。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农技人员的线上服务时间已经超过线下服务时间;用户平均每天在平台上会新增近5000个问题,回答率超过90%,83.4%的问题被解答后得到认可或回应;平台数据显示,农技人员每天进村入户到田服务总里程累计达到3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87圈;平均每天上报实时农情信息约1100多条,整理上传服务日志1.4万多例,发送现场实时图片10万余张,组建推广服务专业群10万多个……农技人员线上线下结合,为农户提供了高效、便捷、实用的服务。

科技为农技推广装上“智慧大脑”

近日,记者拜访了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后台所在地——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华瑞向记者介绍,在对全国31个省(区、市)信息化调研以及形成建设标准草案的基础

上,2017年8月,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并在之后整合了一些地方和社会化农技服务平台。

在平台大数据中心展示厅内,“全国农技人员上线人数分布图”“农情动态”“日星云图”一系列实时数据图表呈现在大屏幕上。在这里,每位农技员的日志、服务轨迹、问答、关注度、粉丝数、被采纳率、点赞数等大数据皆清晰可查。“为了对整体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服务开展绩效评估,我们的平台上建有能覆盖国家、省、市、县、乡镇、农技人员、服务对象的七级网格化实时量评估系统。”吴华瑞说,该做法实现了服务记录数字化、绩效考核电子化和技术指导智能化,规范农技人员服务标准,让农技人员形成工作“自我管理”,也激发了他们的服务潜能。

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在农情监测方面发挥出色。据统计,目前,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的有效农情已超过120万条,每日用户发布日志农情1.5万多条。平台上500余万用户构成了一个全区域、全方位、立体化、移动式的农情实时监测网络体系,每个用户都相当于一个精准的农情“传感器”,进行监测点定位、图像采集、农情上报、需求收集等便捷服务,可以准确反映各地最新农情,让当地农业管理部门实时掌握生产和服务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农技推广信息化平台还积极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产业间的信息化桥梁,积

极对接供给侧和需求侧,撮合农产品市场交易。在展厅的大屏幕前,各地批发市场当日的粮油糖、蔬菜、畜禽等7大类重点农产品价格一目了然,这也是平台对重点农产品开展全产业链大数据试点工作的成果。平台经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公众提供权威、全面、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以帮助用户了解市场行情并作出判断。

如此庞大的系统少不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据介绍,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电信级农业大数据中心,有农业信息化综合人才500余人,确保平台开发人员稳定、平台顺畅运行。“下一步,我们还将配合农业农村部充分利用信息平台积累的农业大数据,构建并完善农业常见病害和技术规程的图文资料和数据库,不断提升信息平台电脑精准识别准确度和人工智能回复、深入解答水平。”吴华瑞说。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说:“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在农技人员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覆盖面和使用率,加速推进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建设工作,让农技人员应用信息化等新方式新理念为‘三农’服务,让广大农民搭乘‘互联网+’的快车,增强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用科技手段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征稿启事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发:nmrpinglun@163.com

形式主义的“到此一访”解决不了脱贫真问题

□□ 胡建兵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为了保证干部“结对”帮扶群众工作落到实处,硬性要求每名包保干部每年登门访贫次数必须不少于几十次。结果,为了“凑数”完成考核任务,一些包保干部“无事也登三宝殿”,陷入形式主义怪圈,反而让包保干部和贫困户双方都苦不堪言。

让机关干部包保贫困户,一人联系几家,定期上门访贫问苦,帮助找穷因、挖穷根,既帮输血,又帮造血,本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手段,也是机关干部下沉农村调研的重要方式。但现在一些地方硬性要求每名包保干部每年登门访贫次数必须不少于几十次,结果为了“凑数”完成考核任务,一些包保干部不断往贫困户家中跑,既没有给贫困户解决问题,反而给贫困户添了乱。有的贫困户在外面做事,接到包保干部的电话,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儿,回到家中接待包保干部。

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扶贫措施,扶贫干部跑的次数再多,也解决不了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如此形式主义“到此一访”还容易让贫困户生厌。各地最应该做的是因户施策,缺文化的帮他们补文化,缺技术的帮

他们补技术,缺资金的帮他们找资金,缺项目的帮他们找项目,农产品没销路的帮他们找销路……总之,上门是为了做事,不能是为了“凑数”。

一些地方要求包保干部登门访贫次数,其出发点没有问题。但硬性的规定和要求,也容易使扶贫工作陷入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扶贫干部去贫困户家摸实情、解难事,原本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既然结对扶贫,就应该把贫困户当家人和亲人,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扶贫干部理应积极主动帮着解决。但扶贫之事,最重要的是一个“实”字。走村入户家访也是如此,也应该既虚向实,单纯地强调数量,不如综合地考察质量。相关部门要让贫困户脱贫,必须与“实”俱进,从长远出发,根据每个贫困户的特点,为他们想政策、练技术、育项目,帮助他们规避风险,使他们从根本上脱贫。在此过程中,还应该大力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帮助他们振作精神,积极想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和项目,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生活,从而使自己活得更尊严。

农村「陪读妈妈」凸显了哪些问题?

□□ 巩淑云

近些年,伴随留守儿童照料与求学问题,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到县城或乡镇租房的“陪读妈妈”。最近这一群体日渐庞大,除了对教育愈加重视外,还因为乡镇教育与县城教育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很多家长只好选择进城陪读。这一群体,越发展越庞大,凸显了农村哪些问题呢?

“陪读妈妈”的出现,背后是农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和基础资源配置的缺乏。农村“陪读妈妈”不同于在家照顾孩子上学的全职或半全职妈妈,她们要到孩子上学的乡镇或者县城租房以进行照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向县乡集中,从而导致农村教育资源不断流失。2001年国务院就基础教育问题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但很多地方盲目“撤点并校”,出现寄宿容量不够、低龄学生不适应寄宿生活、部分高年级学生因求学距离过远而辍学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2012年国务院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加上城乡间流动的加速,农村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集中。

无疑,面对农村孩子减少、教育资源过于分散而导致教学质量低等现实问题,“撤点并校”是优化教育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要有相应的基础资源配置与之配套,如良好的寄宿条件、校车配置等,然而这些基础资源配置在很多地方是缺失的。本来应该系统推进的工作,却只顾一点,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多数家庭选择用脚投票,转去县城上学。于是,为了照料孩子求学,越来越多的妈妈选择异地陪读。

“陪读妈妈”,要面临背井离乡的尴尬身份。这些女性选择到县城或乡镇租房照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职业,不得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关系网络,因此“陪读妈妈”一般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是现实问题。一方面,陪读要面临租房、生活成本明显提高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她们放弃在大城市获取较高的打工收入的同时,其时间因照顾孩子上下学而零散化,无法满足长时段的工作需求,只能打一些零工,收入较低。一反一正,成本提高、收入降低,现实压力变大。第二是生活融入问题。“陪读妈妈”在县或乡租房的生活,一方面离开了原来在农村的生活网络,另一方面,同样是出门在外,不同于打工时工作重心大于生活重心,陪读过程中分量更重的是家庭照料。因此相比于在外打工,她们更多会在生活方面与周围发生关系,也因此面临生活融入的问题。有报道称,有的县城里,城里的女性和“陪读妈妈”不在一起跳广场舞,“陪读妈妈”面临身份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疏离。

“陪读妈妈”,意味着生产\再生产、城市\农村的双重二元分割的加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有两种:生活资料即食物、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种的繁衍。再生产是指维护上述物质资料和生产的人口生产的活动,而再生产的场所主要是家庭。但是家庭中的劳动(生育、子女教育、家务劳动等)是不被计算在劳动报酬中的,并且大多数由女性承担。因此,维护生产的再生产活动被割裂在个体家庭的无偿劳动中。这一现象在城乡关系中被进一步分裂:农民将再生产即家庭放置在农村,产生生产和再生产、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分割。

2009年,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呈现出的就是这种双重分割:父母将家庭置于农村,外出打工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就是为了孩子不像他们一样再出来打工;但是孩子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对学习失去信心,也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叛逆地用自己打工挣钱的方式逃脱与父母间仅存的金钱关系。在矛盾中,父母的希望落空,孩子也没能走出父母的人生。为了不让另一个孩子重蹈覆辙,母亲选择了回家。在家庭-农村、赚钱-城市的两难选择中,她只能选择一个。而“陪读妈妈”的出现,意味着她首先选择了家庭-农村,同时又必须带着孩子进入新的地方,面临新一轮的分离。

“陪读妈妈”是一个“背负”教育、城乡认同以及多重分割的社会关系等矛盾的“问题群体”,缓解她们的困境,也意味着解决农村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要从多方面入手,促进教育资源及教育配套设施的公平分配;关注她们在新环境下灵活就业与融合问题;多方面呼吁家庭再生产活动的社会化等。问题越多,越任重道远,但解决问题的切口也会更多,比如可以从多配置一台校车开始。